

戰爭視域中的困境、堅守與突破

——王鼎鈞《關山奪路》中人性義蘊的展現和其
「存史」、「詳史」的價值

黃雅莉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近幾年來，台灣文壇中回憶錄的書寫是作家展現個人的家國情懷與生命史的重要文本，從中表現了歷史意識與現實承擔。其中尤以大陸遷台的第一代外省作家王鼎鈞的四冊「回憶錄」在家國書寫的表現上有極其深刻的內蘊，四冊中以書寫國共內戰的《關山奪路》向我們展現真實的戰爭本質，以及戰爭硝煙下的人性焮煉，已帶給我們不同一般作品的新信息與新境界。

王鼎鈞在鋪演歷史悲劇的過程中，已展現了具有價值的人生痛苦，並於悲劇中透顯出動人的藝術魅力。本文即透過對此書的分析以見戰爭對小我與大我的影響，透過王鼎鈞個人小我的戰爭視野，以見人們如何在時代困境中的堅守與突破，從而揭示《關山奪路》中的人性義蘊和歷史價值，以及作家對生命的藝術感受和哲學觀照。

關鍵詞：王鼎鈞、現代散文、回憶錄、國共內戰、戰爭文學、《關山奪路》、
歷史書寫

Hardship, Insistences and Breakthrough at War

Disclosing Humanity and Recording True Historical Value of
Ting-Chiun Wang's *Kuan-Shan-Dwo-Lu*

Huang, Ya-L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Recently, the writing of memoirs in the literary arena of Taiwan has been an important document expressing one's family and country mood and life trajectory, and revealing historical inclination and practical responsibility. Among author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from China to Taiwan, the four series of memoirs done by Ting-Chiun Wang demonstrates particularly profound inside story. *Kuan-Shan-Dwo-Lu*, One of the four series describing the civil war between Kuo-Ming Party and Communists delivers new message and explores new frontier by discovering the real insight of war and examining human nature.

Ting-Chiun Wang embeds valuable human hardship and moving artistic charm in the process of repeating the tragic history. This study intends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war on nation and oneself, and discovers people's insistences and breakthrough during the war to uncover the human and historical value in *Kuan-Shan-Dwo-Lu*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ng-Chiun Wang.

Keywords: Ting-Chiun Wang, Modern Prose, Memoirs, Civil War,
War Literature, *Kuan-Shan-Dwo-Lu*

戰爭視域中的困境、堅守與突破

——王鼎鈞《關山奪路》中人性義蘊的展現和其
「存史」、「詳史」的價值

一、前言

九〇年代的文學創作，極少針對戰爭題材下筆，因為這類國仇家恨式的嚴肅題材，有其內在制約與外在的規定性，很難找到某種賣點，不易贏得市場效應的回報，這是一種必然。在過去三十多年以來，國共內戰始終是個極端禁忌的話題，近年來兩岸關係已逐漸破冰解凍，更何況在現今國共和談之際去創作與出版以國共內戰為背景的作品，這種對兩岸而言都不討好的題材，對作家和出版業兩方而言，都是難題。散文大家王鼎鈞「回憶錄之三」《關山奪路》，書寫1945年至1949年之間個人所經歷的國共內戰滄桑史，雖說這段歷史只有短暫的四年，但卻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空前劇變的一段時期，它導致了台灣住民的命運永遠被改變。與王鼎鈞情感深厚的爾雅發行人隱地了解出版回憶錄對這位一生致力於創作的老作家其生命的重大意義：「這四部自傳，王鼎鈞藏了一輩子！」「這是他等待一輩子的自由！」並表示：「出版這一段歷程，不代表『恨』，而是要大家『記得』！」¹出版的意義是要大家不要忘記歷史，從「重建與保存歷史」的角度來看，從烽火淬煉中走出的王鼎鈞的回憶錄如果缺席，國共內戰這段歷史的拼圖便無法趨向完整。

對於生活在台灣近一甲子安逸歲月的我們幾曾識得干戈面貌？戰爭似乎是遙遠陌生的。遙遠，或許可視之為幸運，然而陌生，卻實在是我們的不幸。那個時代之所以遠去，是政治因素使然，但我們心中卻不應遺忘它，因為「1949，不只是千百萬華人遷移流徙的關鍵年，是台灣與大陸分隔的起始年，

1 陳宛茜，〈對岸抗日文學熱——我們重憶國共內戰〉，《聯合報》，2005.05.08。

是台灣哺育兩百萬新移民的關鍵年，更是大批外省族群貢獻台灣的起始年。」² 儘管我們人人都厭惡戰爭，但戰爭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是時代的更迭、社會制度交替的杠杆，更是人性的探測器，作為紀錄和反映人類歷史的戰爭文學，更以其獨到的深度、獨特的背景展現出在和平時代根本體現不出的社會面貌，同樣也放大了在正常狀態下所未見的人性的另一種面貌。如果不能識得戰爭的本質，就難以理解戰爭下的世態人情、大我與小我之間的命運關聯。回顧真實的歷史事件除了讓我們了解時代大事的本質，亦有利於我們理解生命被異化的精神悲劇。王鼎鈞以個人的親身記憶復活了歷史場景，除了「真實空間裡的戰場之外，還加上了心靈空間裡的戰場」³，對於大時代的血淚做出真實的見證。本書以紅焰烽火的洪流為封面底色，立身在這樣背景下的王鼎鈞，顯得既無助卻又無比堅強，在紅焰滔天的暗淡陰影下，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王鼎鈞從危殆苦難走出卻仍然高大偉岸的身影，全書寫來，脈絡清晰真切，藉個人離亂的遭遇，顯現在火焰狂飆似的苦難戰爭年代，人們如何在重重險阻中奪路尋道而出的堅毅忍耐，體驗他潛心創作的堅定與執著，感受到他那種嘎嘎營造的艱辛。王鼎鈞透過此書向我們展現真實的戰爭本質，以及戰爭硝煙下的人性煉，已帶給我們不同一般作品的新信息與新境界。

長期以來我們總以為：「有史無情是史官所長，有情無史乃詩家之風」，於是把歷史與文學截然劃分。然《關山奪路》把個人的經歷揉入到宏大的敘事框架中，把個人的記憶納於民族和國家的傷痕集體記憶的底色上突顯出來，實現「傳記的文學化」，展現存史精神與文學筆法的交融。本文即透過對此書的分析以見國共內戰對小我與大我的影響，透過王鼎鈞個人小我的戰爭視野，以見人們如何在困境中的堅守與突破，從而揭示《關山奪路》中的人性義蘊和歷史價值，以及作家對生命的藝術感受和哲學觀照。

2 沈育美，〈穿透1949的女性之眼——談《巨流河》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灣文學館通訊》26期（2010.03），頁57。

3 席慕蓉，〈歷歷晴川再回首〉，《聯合報》，2009.05.02副刊。

二、題之義蘊：關山難越，奪路尋道而出之必然

所謂「別有人間行路難」，而王鼎鈞所經歷的人生何止是行路難，更是在危機重重中拚卻奪路而出的艱辛，「關山奪路」的定題當來自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云：「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⁴然而「奪」字一出，即令人感受到一種在無情戰火所籠罩的時代與環境中的凶險氛圍，也包含了凶險中仍不屈不撓的求生毅力。全書展現了他所經歷戰爭下的危機與艱險，人性的矛盾與衝突，在時間進程中不斷糾結纏繞，延長前進，然而宇宙的定律是生生不息；人生的法則就是要在困境中尋找出口。戰爭中渺小、脆弱與無助的個體，在無情龐大的客觀險阻中，個體仍繼之以生命力的強烈奔赴衝激，它將提高我們的精神力量得以超越平常尺度，賦予我們勇氣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拼搏，被暫時阻滯、壓抑的個體生命終究在山嶺中奪路而出，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必然結果，也是大自然的智慧。因為宇宙總是遵循著一條必然原則：「每座山都有路，如果沒有路，水如何能流下來」，⁵只要有路可走，儘管是蜿蜒崎嶇的山路，經過努力，翻山越嶺後總會擁有美好的甘甜。「關山奪路」定題即有這樣的積極意義：「人在壓抑之下、憂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進」（《關山奪路》，頁414）。在王鼎鈞十九歲的那一年，局勢混亂，家鄉已被共軍佔領，家人成為流亡的難民，短期的流亡可能變成長期的飄泊，他在竹林裡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為了承擔一個長子的責任，他決定棄學從軍，承擔一家人的生活重擔，當時他的人生有如在一場大霧之中，四顧茫茫，人在這個時候是孤獨的，十九歲的孩子，只有自己作出決定，自己負擔後果，但是不管朝那裡走，他知道自己不能永遠停留在原地：

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腳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長。……我想，我能走出這一步，算是長大成人了！（《關山奪路》，頁17）

4 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據《全唐文·卷一八一·王勃》引。

5 《關山奪路》，頁149。以下引文接在文末直接標明書名及頁數。

作者在面臨絕境之時，仍展現著人性的堅韌——要活下去，要走出去，背負責任，承擔義務，在苦難的面前，仍具有強烈的決心。「壓傷的蘆葦自己不肯折斷，將殘的燈火那是自己熄滅。天助人助者，人助自助者」（《關山奪路》，頁414），憂生不是目的，僅僅憂生也不是生命的崇高，崇高的情緒是在經歷了生命的阻滯時，立刻想到人生的使命，企圖超越現實險阻，這才是生命的崇高，才是憂生的目的。又如他在穿越秦嶺，由安康北行，國共兩軍正在東西華北作戰，此去正是走向殺聲重圍、山尖峻峭，他說：

想起「上帝不能造兩座山中間不留空隙」，人從山縫裡找路，人也在山縫裡耕種，生兒育女。（《關山奪路》，頁44）

人為什麼要世世代代住在山裡？為什麼不離開？「路是人走出來的」啊！……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走，一定要走出去，山路崎嶇，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冰冷，一天之內好幾個寒來暑往，由腳掌到足踝都磨出高溫，如炙如烤。走啊走，推開群山萬壑，人要走路，山擋不住。（《關山奪路》，頁48）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水要走路，山擋不住；人要走路，山也擋不住，生命在受挫時迸發出的抵抗力激起了人的勇氣，引發一種向上的感情，要求打破自身的局限，戰勝自身的渺小與脆弱。王鼎鈞在《關山奪路》的新書發表會上說：

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關山奪路」四字之用意在於在絕望中尋找出口，人生才見精彩。「人若是一切都美滿、得意、順利，沒有絲毫的艱難、困苦和不幸，生命就可能因無

限膨脹而走向滅亡。」⁶王鼎鈞在全書中從自我的角度，也就是從一介平民、一個大兵、一位文學青年角度，在國共內戰期間，如何流亡、從軍、逃難，試圖找出一條出口與生路，在莽莽關山、處處凶險的危殆中，稍一不慎，也許就被烽火吞噬。在過程中，他歷經了被所信任的同學師長欺騙的痛苦，經歷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絕望，在絕望中他不斷的掙扎前進，在朝不保夕中但求活下去，活下去的理由是為盡自己來到世上一遭的責任，盡為人子、為人兄的責任，盡立德立言的創作責任。即使目睹許多的血淚苦難與災禍，但卻不厭棄人生。

在重重險峻的「關山」中如何「奪路」而出，端看個人的操持與定力，而讀者，正是從閱讀中找到了自己堅強的理由和賴以維持的這份堅強的信心。在文字中發現隱藏其間的答案、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命運的交纏迴繞，其實，這也正是文學的時代價值之所在。

三、創作動機：「蚌病成珠」發憤傳統之延伸

古代文論家對於作家的創作動力提出了很多理論命題，如發憤著書、不平則鳴、窮愁著書、自娛自適、遣興悅情說，這些命題實際上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有為而作」的「發憤著書」說；二是「自適其適」的「著文自娛說」。二者同為創作的動力。創作動力來自於作家生命的需要，但形式卻有不同，「發憤著書」是強烈巨大的創作動力形式，「著文自娛」則是一種較為穩定平和的創作動力。二者心理能量相差巨大，「發憤成書」的作家往往具有較強烈的批評效益，作家代表著社會的進步力量，有著極強的社會責任心、使命感和正義感，敢於同惡勢力抗爭，因而，他們的憤情並不單單是一己私情，更是蘊含著積極進步的社會內容和強烈的正義精神，以「憤」為動力，往往能克服艱苦，作出驚世之作。王鼎鈞創作《關山奪路》當屬於「發憤著書」這一路。作者所追溯的那段歷史，對他個人來說，是浸透了苦與難、血與淚的。他內心深處應

6 童慶炳，〈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08），頁33。

不願重提那些令人心悸的年代，但一個作家的良知和膽識，不允許他將那場空前的民族災難全然忘卻，他認為自己有必要向世人告白這樣一段滲著苦難與血淚的人生經歷。他說過：

對日抗戰時期，我曾經在日本軍隊的占領區生活，也在抗戰的大後方生活。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峰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我做過俘虜，進過解放區。抗戰時期，我受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受專制思想的洗禮，後來到台灣，在時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裏解構，經過大寒大熱、大破大立。這些年，咱們中國一再分成兩半，日本軍一半，抗日軍一半；國民黨一半，共產黨一半；專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傳統一半，西化一半；農業社會一半，商業社會一半：由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這一半，有人只看見一半，我親眼看見兩半，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叫我作個見證。（《關山奪路》，頁430）

在奪路存命之虞，當時的人絕無閒情餘暇來記載史實與心情，但王鼎鈞卻把當年的經歷與心情一一收錄他的記憶庫，他慨歎自己經歷的血淚烙印的歷史為今人所不知，所以在耄耋之年仍筆耕不懈，因為他堅持要為上一代中國人立傳，為近代中國留史，來讓後人了解那個時代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所有歷史事件的經歷者，特別是重大的歷史現場中碩果僅存的當事者和知情者，不論是對自己、對世人、對後人都必須有所交代，不應帶走這一段歷史，而應有更積極的存史態度。王鼎鈞對《關山奪路》的經營，無疑具有這樣偉烈的責任心，每個人都有自己薪火傳遞的文化使命，作者親身經歷國共內戰的歷史變遷，經歷中國分裂成一半又一半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其複雜性豈是後人所能想像和體驗的？由於這一段歷史是在跌宕起伏中疾行，歷史場景變動極為頻繁，不免留下了許多空白，一份留有許多空白的歷史記錄，會造成人們對歷史的誤解，影響後人「鑑往知來」的歷史感知能力。這就需要知情者與親歷者的說明和見證，王鼎鈞的回憶錄就是歷史現場的目擊證人與證詞，表現當事人心

中的徬徨、苦悶、不解，讓一個時代的心聲在文學中得以展現。

他的回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借自己的經歷與感受來反映那個時代眾生的存在，由有限中見無限。他說：

國共內戰造成中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希望讀者由我認識的內戰，由內戰認識五千年未有之變局。（《關山奪路》，頁430）

他的寫作，有著更大的企圖心和使命感。而這樣的書寫無疑是痛苦的，因為回憶太苦，而這樣的書寫也是高難度的，所以寫了十三年；但作者的反應是積極的，他不回避問題，不怕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同時又堅信一切會更好，明天必定是光明的。憑著這一點，在那個苦難的時代能堅強地活著已實屬不易了。即使他所追溯的這一段歷史，對他個人而言，是浸透了苦難與血淚，但一個作家的良知與真性情，不允許他將那場空前的民族苦難全然忘卻，他認為自己能倖存活著就有向世人告白歷史真實的責任，所以他忍著心靈的苦痛，敘寫了一個人、一代人、一個民族不願回首的過去。正如他在序文中所言：

那時，我「主修」過幾門功課，得到許多紀念品。我收藏、諦視、摩挲，最後，我要公開。珍珠不該是蚌的私財。（《關山奪路》，頁1）

生活的悲歡點滴、生命的記憶原是作者最珍貴的寫作材料，而寫作，就是召喚記憶。在作品中清晰地留下這段心路歷程的軌跡和心中所承受的壓力，也只有通過作品將鬱結壓抑在自己內心深層的壓力暢然一泄，才能獲得心理的平衡和心靈的自由。對一個創作而言，生活的滋味越苦，往往創作的果實就越豐碩。苦難的經驗對於作家，的確是一筆精神財富，恰如珍珠結晶於蚌肉體上的創口。王鼎鈞他了解到這樣的記憶不應只是個人的私有，他感悟到自己的記憶是抽樣代表，足以反映一個時代的謬誤，供後人借鏡，並可以連結同代人共有的記憶，所以把私記憶公諸大眾，要從自己的深藏的記憶庫中去掘取、還原、記錄。

如何使這段回憶不致成為史料的堆疊或是血淚的控訴，是創作的一大考驗。王鼎鈞提及他創作《關山奪路》的心情：

這四年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控訴、吶喊而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采。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昇華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現出來。……讀者不是我們訴苦伸冤的對象，讀者不能為了我們做七俠五義，讀者不是來替我們承受壓力。拿讀者當垃圾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團體任意擺佈的時代也過去了！讀者不能只聽見喊叫，他要聽見唱歌。讀者不能只看見血淚，他要看血淚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見染成的杜鵑花。……最後我說個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體裏頭結成的，但是明珠並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憶錄是我對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對國家社會的回饋，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說出來了。（《關山奪路》，頁433）

時代的命運把王鼎鈞的青年時代安排在殘酷的國共內戰之中，他在大苦大難中倖存，如此的遭遇對他本人而言，當然是一種不幸，但就其對文學的創作而言，又不失為一種幸運。「正視痛苦、反芻痛苦」、昇華與超越痛苦（《關山奪路》，頁368），早已成了王鼎鈞面對人生的態度，也成了後人閱讀其作品的精神財富。一位作家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家永遠是感情最豐富、最敏銳、洞察最深刻的那一種人，他們生存於現實環境之中卻能超越於現實環境之上，唯其如此，他們才能夠雖身臨其境而不被現實淹沒，雖經歷苦難卻不會因環境的改善而輕易忘卻苦難，他總能親身地感受和聯想到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去思考和探索人的生存價值。有論者說：「這段時期的歷史好寫，但這段時期人民的感情難寫」，⁷ 感情的難寫當是親身經歷苦難的刻骨

7 李宜涯，〈血淚與珍珠——紐約訪王鼎鈞談《關山奪路》〉，《文訊》238期（2005.08），頁136。

銘心，所以個人必須努力將執著的心情和當時的處境拉開距離。生活經驗必轉化成為文學，「當歷史都進了漁樵閒話，這就是文學的境界」。⁸ 戰爭的歷史記錄並不是戰爭文學。正如史詩，其重點在「詩」而不在「史」，戰爭文學應是對戰爭作出的一種具有美感與詩意的文學性描寫，如同王富仁所言：

戰爭是建立在民族與民族、黨派與黨派、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和仇恨之上，但戰爭文學卻不應當是上述矛盾的產物。戰爭文學產生於戰爭，由戰爭激發而來，戰爭文學裡面有著戰爭的回憶，但並不是戰爭的本身。戰爭文學是由仇恨造成的，但它本身不應當是仇恨。戰爭文學是由分歧、矛盾，由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相互踐踏所誘發和引起的，但它本身絕不應該是所有這一切，而應當是這一切所激發出來的人類向美、向善、向和平、向世界大同的那樣一種感覺的升華。⁹

由此可見，戰爭文學的核心是展示在戰爭時期人們的命運與心靈狀態，作家憑藉自己的人生閱歷，對人類命運做出深沉思考，對人生與藝術境界作更高層次的追求。本書以其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充沛的文學熱情，拓展了人們的歷史眼光和哲學視野，在創作上也打破了反共文學的規範化、模式化的樊籠，作家的創作個性逐漸顯露和發展，其得以保持脫離政治以外的獨特魅力，不正是因為其字裡行間都開滿了真摯的情感之花嗎？這樣的一部優秀作品讀來，不得不讓讀者潸然淚下，因為愈是痛苦作品，愈具有反抗愁苦的生命力量源源生出，血淚必須化作明珠，作家受到的傷害越嚴重，其作品中反映的思想內容也就更深廣，因為只有經歷了痛苦，痛定思痛之後，心靈才會超越，讀者才能從中得到啟示。

8 李宜涯，〈血淚與珍珠——紐約訪王鼎鈞談《關山奪路》〉。

9 王富仁，〈戰爭記憶與戰爭文學〉，《河北學刊》5期（2005），頁167-178。

四、從「詳史」的角度來看戰爭之因與果

人間世的千種緣份、萬般糾葛，皆繫一個「因緣」上，今日的「果」，實是昨日所種的「因」，任何現象都有其產生的原因，任何原因必然導致一定的結果。戰爭不會憑空產生，它是戰前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的總體爆發。經歷了這場改變中國歷史的大動亂，人們不由得不去思考，二百萬軍民為何遷移流徙，形成台灣與大陸長久的分隔？政治學家與歷史學者們多從戰略、政策、社會經濟等因素來探討，但王鼎鈞乃是探入更深層的人性與心理層面來了解戰爭的因與果。隨著六十年時間的推移，當年禁忌的話題也逐漸在人們的心中解嚴退冰了，近年來台灣文壇上相繼有幾位作家終於可以摸著自己比較溫熱的心，站在人性的角度來看待1949年這個時代的爆破點，檢討是非對錯，反省它的事起和敗因，而不是總是讓這個問題被壓抑在歷史的冰窟裡。¹⁰而王鼎鈞更以親身經歷者的獨特視角迥異於其他作家以轉述或採訪的間接紀錄，對於當年發生事件的分析與推斷，對國共兩方皆有著較之他人更深的挖掘與評斷，茲分以下三點來說明：

（一）國民政府的衰竭到敗陣

1. 失去公眾的信任與敬意：種欺騙之「因」致「離心」之「果」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雖有「兄弟鬩於牆」的一面，但主要仍是「外御其

10 例如林博文，《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台北：時報文化公司，2009.05）、《1949：浪濤盡英雄人物》（台北：時報文化公司，2009.05），以談古論今的筆調來針砭當年的種種時事，作者以知識份子的角度，檢視一九四九年以來兩岸內部的變化、中美台關係的演變，觸及蔣介石的撤退、韓戰風雲、美國與中共的間諜戰，以及政治舞台上來去的人物。此外，如吳錦勳以訪談十七位人物寫成的《台灣，請聽我說——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9.08），邀集了林懷民、朱天心、胡乃元、星雲大師、吳念真等十七位不同領域、世代和文化背景的人物，以第一人稱的紀實筆調，書寫他們的生命故事，藉以勾勒出一甲子歷史的複雜情緒。此外還有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9.07），作者寫父親齊世英所經歷的巨流河功敗垂成的一戰，渡不過的巨流像現實中的嚴寒，從此開始了東北終至波及整個中國的近代苦難。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出版社，2009.08），透過龍之雙親到台灣的過程，輔以許多同時期他人的經驗，從不同的國家、區域角度談論1949國民黨軍撤退至台的多面向思考，細味在國共內戰下那一代人——也就是讀者的父母或祖父母輩——在戰爭中的如何飽受生離死別及顛沛流離之煎熬。皆為書寫國共內戰的作品。

侮」，有著共同而明確的目標：趕走日本帝國侵略者。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飽授日軍蹂躪的中國土地，猶待重建，沒想到抗戰勝利之後，是另一場民族劫難的開始，內戰隨之而起。19歲，剛讀完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王鼎鈞，當年因八年抗戰而從家鄉逃出來，抗戰勝利後原本打算回山東老家，父親卻託人傳來「不要回家」的口訊，原來在國共互相拉鋸之下，山東各地從日本佔領下的「淪陷區」成為被共軍接收的「解放區」。¹¹王鼎鈞的父親帶著弟妹逃出家鄉成為難民，他為了一家生活的重擔，決定棄學從軍。國民政府為了準備內戰，除了軍事上的準備，還有心理層面上的對立與拉攏等戰術，為了達到目標，領導者只利用國人的信任，用煽動的語言來吸納人心。如何使騙術得逞，端看將部署將領如何用響亮的政治語言妝點發揮吸納人力的最大功效。在那個年代，青年們對北京這樣的大都市都懷抱著前進的期望，當時十九歲的王鼎鈞正巧見「憲兵第十四團」來校貼出「憲兵學校招考通告」，身處四面環山的漢陰，資訊缺乏的學生，卻把這張不負責任的通告，視為遙遠的希望，紛紛報名並被錄取；但是校中有十幾位教師沒人告訴他們，不管是步兵學校、砲兵學校、還是憲兵學校，都不是初中學生能夠投考，而招考的單位，只是吳連長個人，而非學校單位。沒有老師願意露半句口風告訴他們，這樣的通告應由憲兵學校校長署名，應該加蓋憲兵學校大印。甚至有分校主任以共犯之姿來為吳連長「背書」，六十年後，王鼎鈞回憶此事時仍痛心地说：「這算什麼人師！很久很久以後，我才能夠原諒他們。」（《關山奪路》，頁19-21）吳排長之所以能誘騙這麼多學生，不是靠他的口才，而是師長的幫襯，這是真正令王鼎鈞內心受傷的原因。

你若問我人生怎麼開始，鄉中父老說過一句話：小孩子是騙大的。李仙洲沒有騙我們，所以我們還沒長大，李仙洲失勢了，沒法再照顧我們，我們在山坳裡等著挨騙。……騙局總是針對人的貪念做出設計，我們妄

11 解放區：戰爭期間，日軍只能信領城市，控制鐵路公路，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和山地組訓民眾，發展游擊武力，立地方政權，稱為解放區。參見王鼎鈞，《關山奪路》序言，頁2。

想佔盡天下便宜，活該報應，可是政府行騙，政府縱容默許行騙，總不成體統，可憐我們懂什麼，書本教我們相信政府，相信長官，相信現有的制度，我們還沒學會懷疑。（《關山奪路》，頁23）

「抗戰八年，軍事第一，國民政府開出了多少空頭支票！各地軍政當局從未因為欺騙人民受到處罰，即使是嚴重的陷害。」（《關山奪路》，頁23）蔣介石曾對官兵承諾北伐勝利全國統一之後，凡是參與北伐的官兵，都可以得到一份田地，然而北伐勝利後，授田並未實行。在那個年代，「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是真的」，「你如果行騙，必定騙最相信你的人」，「政府只好打擊擁護他的人，削弱他的基礎，飢不擇食，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公務員、軍人、青年學子受害最大，政治人物習慣說謊，但昨日種種，國家大而化之，但被騙的老百姓是刻骨銘心」。（《關山奪路》，頁23）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習以謀略騙取權力的正當性，那個年代，在國家至上的價值觀下，老百姓成為工具，在位者說了一次謊，下次就必須用更大的謊來掩蓋第一次謊所造成的後遺效果，說謊最後會變成對自己的咀咒，讓人們等著看他會在第幾次說謊裡把自己埋葬掉。智慧的欺騙埋下惡的種子，尤其是政府講究潛心策劃，精心設計的謊言，騙子的騙術終有被窺破的一天，政治型塑的謊言使得受騙的一方，從此對社會複雜性有了深入的認識，從此讓民眾對政府失去了信任與敬意。

2. 靠不住的軍力：反常訓練，造就心中無愛與人格破碎之兵

王鼎鈞說：

實在沒有想到，出了李仙洲的保險箱，關進憲兵團的保險箱，第一個保險箱想使我們與日軍隔絕，後來第二個保險箱想使我們與社會隔絕。

（《關山奪路》，頁49）

作者在文中生動地描寫了國民政府的軍隊訓練方式就是打人，「原來新兵訓練就提挨打，操課教材無非是打人的藉口」（《關山奪路》，頁51），沒

有準則的打人，一邊打人還一邊「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老百姓』是每個新兵的原罪」。王鼎鈞批評了此種言行：「兵士來自民間，帶著民間的習性和身段，也許和軍事訓練的目標相背，但是你不該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該藉此醜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來。」（《關山奪路》，頁57）新軍身受班長以愚昧又落伍方式來訓練，他們「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這樣軍隊怎能得到老百姓支持」（《關山奪路》，頁56-57），對人的輕視是人性本身就存在的扭曲，對新兵尊嚴的踐踏也是軍中流行已久的慣性，「他們用心剪掉我們思想的翅膀」（《關山奪路》，頁51），軍中有階級，又是封閉團體，如果犯罪，通常是集體共犯的結構性犯罪，並以口耳相傳的「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種似是而非的金科玉律為保護傘，王鼎鈞提出批判：「訓練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練之中，磨練也就可以冒充訓練，磨練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為樂趣的心態，也就百年不絕。」（《關山奪路》，頁59）

軍隊的存在是一種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業不同，因之，軍人所受的訓練，「老百姓」很難了解。那時，建立軍隊的特殊性，要從人人挨的時候甘之如飴開始。他要摧毀我們每個人的個性，掃蕩我們每個人的自尊，要我們再也沒有判斷力，再也沒有自主性，放棄人生的一切理想，得過且過，自暴自棄。據說人到此時，從自輕自賤中生出勇敢，萬眾一心，視死如歸。我稱之為「無恥近乎勇」。（《關山奪路》，頁62）

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應該視它如何看待人的價值觀，班長用踐踏新兵的自尊來表現自己的英勇與權威，當時絕大部份的人在這種特殊的軍事訓練下，都無奈地接受了人是政治工具這樣的一種人生現實。新兵訓練讓人在絕對服從的紀律下被迫拋棄人性，當人拋棄人性的時候，獸性的凶殘促使被壓迫者不再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沒有感情甚至沒有思想活動。折磨新兵的可怕不僅是對肉體的殘害，更是對人性的摧殘，讓人的精神崩潰之後不成人，進而欲與社會隔絕。

新兵訓練和流亡學校的新生訓練確乎不同，兩者的區別，並非僅僅是嚴格到什麼程度的問題，而在新兵、新生一字之差。設立學校是教學生如何求生，使自己生存也使別人生存，新兵訓練卻教人求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或者同歸於盡。……這是最特殊的一種訓練，也是最反常的一種訓練。（《關山奪路》，頁61）

作者的抱負是讀書，但被從學校騙出之後，從此與求學無緣，卻只能接受這種制式化訓練，作者透過對荒唐年代的無情揭露和深刻批判，分析士兵受到破碎人格的訓練之後的結果是：人的尊嚴、人的個性完全被扭曲、被抹煞，把人的全部生存價值奪得只剩下單一的政治生命。這使我們不得不去思考：人在政治生活中，究竟置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把軍人視為一種工具，人的存在價值只表現為單一的政治現象，這樣的軍隊環境最終導致人性走向異化：

新兵訓練是一種輪迴，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此這般捏塑而成的士兵，當然不會愛民，一個人格破碎的人很難有愛，更難有大愛，除非後來從宗教情操得到救贖。如此這般成長的人又怎會威武不屈？如果班長是他們的教士，「胳膊拗不過大腿」，「別想拿雞蛋碰石頭」是他們代代相傳的聖經，後來內戰的戰場上，處處有「四十萬人齊解甲」的大場面，也就事出有因了。（《關山奪路》，頁62）

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軍隊的是否訓練有素、部隊的道德面貌和政治素質都是重要條件。奮戰不懈，視死如歸，以身殉國，是革命軍人的本色，但四十萬人居然對著只有幾千人的共軍不戰而降究竟所為何來？作者追溯遠因即是來自於軍隊訓練下的人性異化。當年國軍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已，更是內心不知為何而戰的失敗，即使戰爭沒有使他們死亡，他們也成為了沒有生命渴望、無力企求、無慾追尋的命定人格，最後以集體投降的姿態選擇死亡。

當國民政府一直沿用落伍的方式訓練新兵，當時的中共並不是這樣練兵的，他們是另一套文化，解放軍走出解放區，對老百姓親親熱熱地叫聲老大

娘、老大爺。琅琅上口的是：「人民的軍隊愛人民！」（《關山奪路》，頁74）當國軍必須要辛苦地把立正站好，「站得腰酸背痛，頭暈眼花，站成木雕泥塑，死灰槁木」（《關山奪路》，頁75），必須踢正步地承受苦刑，共軍卻在苦修另一門課：怎麼背炸藥包，挨近碉堡，引爆炸藥，使後繼者一舉攻下。他們完全不必學習立正姿勢，不必關心全班士兵的鼻尖是否在一條線上，全班棉被是否折成有棱有角的豆腐，他們臥倒、起立，也不必像天橋的把式一樣好看。（《關山奪路》，頁75）王鼎鈞對這種制式化的訓練提出了評斷：「內戰正式開打，國軍坐困孤城，死而後已，正是『立正』訓練的長遠影響。」（《關山奪路》，頁77）

此外，日軍投降後，國民政府裁汰軍官十四萬人，讓這些編餘軍官無路可走，¹² 這些軍官都覺得受到領袖和政府的欺騙，他們為自己求公平，辦法就是集體擾亂社會，欺壓官民，軍官總隊紀律極壞，有人說，蔣委員長曾對他們演講：「我的事業就是你們的事業，你們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這人說：「現在我們的事業前途都完蛋了，且看他的事業前途還能有多少！」（《關山奪路》，頁177）這次裁軍的將官到中山陵「哭陵」，發洩心中的憤懣，國民政府蔣主席聽到報告，怒斥這哭陵的人不識大體，王鼎鈞卻說：

我總覺得蔣氏理政往往沒有因果觀念，辣手裁軍，種下這樣的「因」，居然想結個「識大體」的果！（《關山奪路》，頁178）

作者敢於評斷，毫無隱諱和偽飾，從因果的角度評論現實，還原出當時軍中的腐化蠻行與人事傾軋的原生情狀，使人物的意念與決策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復活起來。

此外，作者又從心態上評論當年國軍心高氣傲，瞧不起地方武力所導致的失敗：

12 《關山奪路》提及：「解甲歸田本是美談，可是編餘軍官有三個原因不能回老家：其一，老家已成解放區，不能回去。其二，老家可以回去，但是苛政太多，官吏太腐敗，軍隊紀律太壞，第三，親友的輕蔑。」頁176。

所謂地方武力，概指抗戰八年殘留的游擊隊，所謂殘留，因為這些游擊隊跟共軍勢不兩立，雙方經過無數戰鬥，大部分已被共軍消滅，這些地方武力能頑強生存下來，自有他的長處，他們身經百戰，了解共軍的戰術，他們深入民間，情報靈通。國軍把他們看成多餘，實在是天下第一糊塗蟲。（《關山奪路》，頁301）

國軍眼高手低，自命高貴，卻不明白縱使有更高超的計畫與謀略，一旦離開了特定時代的社會實踐，脫離了付出勞力的地方群眾，終將無所作為。從某個角度來看，國軍之所以失敗，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失去了群眾的支持。

當年士兵受到破碎人格的訓練，其結果是「教育出來幾百萬鄙視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來」：

那時國軍從不結合民眾，他們不讀史，不知一個農夫關係戰爭勝負、大軍安危。在他們看來，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好像不是跟共軍作戰，而是跟全體老百姓作戰。（《關山奪路》，頁301）

軍民對立，國軍已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許多軍欺民、殺民的故事血跡斑斑，他們忽視了廣大的勞動人民的重要作用，「以後國民政府調兵遣將，軍人和民眾始終各有各的喜怒哀樂，彼此之間很難有同感」（《關山奪路》，頁40），失去了民心的軍隊，從而也失去了戰爭的詮釋權。

由以上所述，且不說通貨膨脹與經濟崩潰，導致社會與經濟改革之遲滯，也不說美國調停與援助之失敗，單就國民政府缺乏政治革新的誠與意與氣度，在對付中共、治理國家、和處理黨務上，犯了太多的錯誤，包括用人不當、施政不對、低估中共和錯估民心向背，心高氣傲，輕視百姓，國民政府和黨機器的腐化無能，終於導致「金陵王氣黯然收」的結果，終究失去了大陸江山。即使在未來企望收復大陸的夢想終究破滅，毛澤東階級鬥爭完全靠邊站。

（二）共產黨反人性倫常

當全國忙於對日抗戰時，來自蘇聯異域的邪惡共產主義思想被引入中國，伺機壯大聲勢：

抗戰八年，每一個相信國家許諾的人受了傷，都正在護理謊言重創後的心靈，而中共新興乍起，猶能以遙想的理想鑄造鋼鐵騎士！……中國對日抗戰製造大量廢品，但中共蓄精養銳，國共內戰可說是廢品對新品的戰爭。（《關山奪路》，頁24）

戰爭所產生的廢品是因政治黑暗面的搏戰帶來的生靈塗炭，日軍侵華使得人民過著如死水般的苦難生活，然國共內戰卻只是苦難的重新分化與組合，是廢品對新品的戰爭。抗戰時期，中共在表面上團結各階級共同抗戰，刻意以改革社會的口號來凝聚人心，中共一開始對大地主與大商人們親切友善，但地方士紳迫於形勢，個個都是國共兩面敷衍，抗戰勝利後，日軍撤走，共軍前來接防，大小幹部全變了臉，而且是無緣無故翻了臉。（《關山奪路》，頁108）作者與難民相處三天，用他們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圖形：

中共要澈底掃除構成這個社會的主要人物，這些人物的優勢，第一是財產，第二是世襲的自尊，兩者奪乾淨，精英立時變成垃圾。人要維持尊嚴，第一把某些事情掩蓋起來，第二對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釋，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脫褲子」，脫掉他的褲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財產，他從此必須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討。他的子女已經參加革命，親友也和他畫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滅。（《關山奪路》，頁112）

中共佈置一個恐怖的環境，人人自危，只有幫助幹部定別人的罪，你才有安全感，一旦你已被定罪，你也可以產生安全感。「民主」就是人人忙著定別人的罪和人人忙著認自己的罪。（《關山奪路》，頁113）

共產黨對私有財產制度否定，讓人的個性泯滅，剝奪人的私人生活，摧毀

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讓每人沒有朋友、家庭、宗族、鄰裡，讓每個人都孤立無助，只有依靠黨的組織。人人都是社會的叛徒，卻是黨的馴服工具。大整肅來了，人人注定要出賣他的親人朋友，人與人之間互相清算，「起初，人要經過內心的交戰，後來就成為制式反應」：

生活就像洋蔥，一片一片地剝開，總有一片會讓我們流淚。……政治運動一波又一波發生，每一次你都得畫掉一個人，同時你也被別人畫掉，並不是一面流淚一面剝洋蔥，而是你慢慢學會了痛恨你畫掉了的人，你理直氣壯，心安理得，沒有絲毫內疚。最後，你學會了畫掉你自己，這時，你就是一個「新人」。（《關山奪路》，頁311）

作者從心理的層面來分析共產黨絕對荒誕的統治理念正對當時中國人性進行烈性毒藥式的改造，也為中華民族帶來前所未有的重大災難。人與人、與社會更好的可能性，只在道德與生命意義的探索中。一個關心別人的處境和尊嚴，必是出於自己內在尊嚴體驗的人。人與人之間必須透過情感與關係來建構，這是傳統儒家的倫理觀念。然而，共產黨的觀念形態，卻呈現了另一種迥異的狀況，他們以「弓馬之利取天下」，帶著處於社會發較低階段的剽悍和勇猛，闖進了倫理觀念十分嚴肅的中國大地，他們沒有敬天畏天的信仰，沒有禮教倫常的崇拜，他們以打倒、鬥爭、清算他人來佔有他人的擁有，所謂「親不親，階級分」，將一切人情強制排擠到黑暗之中，以摧枯拉朽的力量異化人性，在一個徹底喪失了尊嚴的無賴群體之中，幾乎沒有真正的良知和關懷可言。共產黨員熟稔、有組織的浩大訓練，由上到下，已成了一片反道德倫常的潮流，他用權力手段摧毀各種人間情份關係，人們為了表現自己的忠黨愛國，不惜為此檢舉父母家人好友，打倒自己的親人，讓人們認為自己站在公理正義的一方，每個人都因此瘋狂地為國家「盡一份心力」，自稱有理，「偉哉壯哉！神乎魔乎？」（《關山奪路》，頁311），一個敗德的時代就已被大大的打開。敗德而有理，乃是復歸野蠻的開始，處在這種矛盾、衝突中的中國人不能不作出反應，漸漸地，人再也不是有父母、親情的人，「考驗越來越嚴酷，刀

尖向內，兒子清算老子，妻子檢舉丈夫，最好的朋友掌握你的秘密，也最有資格置你於死地。」（《關山奪路》，頁306）許多人不時被近在肘腋的人推上審判台，甚至差點投進監獄，在那個極左思潮泛濫的年裡，人性和人權受到粗暴的干涉和踐踏，人格和人的尊嚴受到野蠻的污蔑和蹂躪，作者一一歷數，還原了生存境遇下的人性悲歌。共產黨使得中國歷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正常的社會秩序被打亂，舊有的道德觀念淪喪。貪腐、狡詐、野蠻、凶狠、玩法弄權、挑唆煽動，這是文明社會不容許的敗德品質，但這種悲哀在堂堂正正地上演之中。作者回顧了那段道德淪喪、人性扭曲、社會變形的歷史，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生，特殊的生活，令人感到驚心動魄。

戰爭是人類所處最極端的環境之一，它將人性推向極致，我們看到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異化。每個人為了讓自己活著，就只有身不由己地對同類殘暴。究竟是戰爭導致了人性的異化，還是人性固有的惡引發了戰爭？究竟是人在環境中邪惡，還是環境使人邪惡？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如果說人性的異化是因為戰爭而發生的變化，那還不是最糟的狀況，如果人性本身就存在邪惡的扭曲，恰好遇到了戰爭，邪惡的本性就像乾柴遇到了烈火，一發不可收拾，那才是人類真正的悲哀。

（三）突破二極對立的政治框架結構，以公平的角度論國共雙方

六十年來有關昔日國共鬥爭史的詮釋框架基本有三：國民黨史觀、共產黨史觀，以及第三者的史觀。長久以來，史觀與歷史的詮釋權，往往被當代權力強者所壟斷，他們往往對過去的歷史軌跡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解說，甚至以此定調版本主宰後世的歷史書寫的架構，這就是所謂的「現代的人決定過去」。從小我們在台灣的教育都由國民黨主導，對於國共內戰的始末教科書上也只「政府播遷來台」一語輕鬆帶過，許多歷史的陳述與事實有所偏差，我們讀到的歷史只是片段中的片段，甚至強化了偉人崇拜的思想。中共是以「勝者寫歷史」的姿態來詮釋「建國大業」的艱辛，避開了他們的在混亂時刻伺機坐大赤

化大陸的種種偏離人性的權謀。左右兩岸，各說各話，各執一端，多半為其意識形態或主義主張來論述，那能把置身其中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放在心上。兩岸的「官方歷史各自摸到了半個大象的身子兩條腿，王鼎鈞把握了一群大象的靈魂」，¹³《關山奪路》以其悲天憫人、關懷眾生的眼力，讓我們看到了這場戰爭的真實面目，他回顧了那四年眾多人所經歷的曲折，那是一段延緩了國家建設，給民族和人民帶來了不幸的時期，雖然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回首往事是有益的，有許多教訓需要總結，社會需要是一種超脫政權見解的歷史文化觀，而作者論史的角度，較貼近於以知識份子為主的第三勢力，而且是以一個親身經時代的知識份子的眼光去看待過往。作者運用獨特巧妙的多重視角，對於歷時四年的國共內戰，對於大陸淪陷的前後過程有著清晰的敘述，帶領我們一窺蔣氏政權樓起樓塌之片羽鴻爪，也帶領我們見證在共產思想洪濤的泛濫下，信仰價值的崩解、倫理親情的摧折的種種亂象，其中對國共二方有許多深刻而慘痛的反省和檢討。例如：

任何個人或群體的大惡大錯，都不可能只是一人的犯錯或偶然的偏差，政治與道德上的共犯結構。

在一種權力之下，無論那權力多小，多暴虐，無論那權力給你多大痛苦，總有受苦人攀附它，出賣同類，逢迎它的需要。（《關山奪路》，頁54）

戰爭是人類生命的敵人，但它又是人類自己製造的。從歷史真實的敘事角度來看，戰爭必然展現兩個世界或不同陣營間的對立與衝突，展示了不同的群體的人們如何為自己的信仰與堅持、為存亡而戰，這使得參與戰爭中的人往往具有一種崇高的堅持理念精神。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戰爭或許有崇高的理由，但背後更多是人性的動因，是一種權力慾亟待擴張的私心，手段就是通過傷害

13 楊傳珍〈戰爭文學的精神轉向〉，《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卷6期（2008），頁17-20。

他人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王鼎鈞從人性的角度或揭露控訴，或反思批判，在一定的意義上，都是一種歷史總結。正如楊傳珍所說：

戰火的燃起，不是黎民百姓和知識份子反戰不力，而是交戰的一方或雙方的社會矛盾累積到了一定限度，決策者認為，用戰爭的方式解決這些矛盾對自身最為有利，於是尋找借口，發動戰爭。可以說，老百姓是無奈地被拖進戰爭的，他別無選擇，只能承受。¹⁴

人類以多種名目展開殘酷的戰爭，潛意識都是為維護自我的生存或擴張生存的空間而去攻擊他人，戰爭往往隱含了人性的自私、慾望、破壞、毀滅的非理性層次，攻擊對方擴展而為打天下的重大浩劫，在完善自我的同時，都可能為民眾、為國家民族造福或傷害，甚至毀滅。元曲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戰爭或許沒有誰對誰錯，許多的戰爭都是為了幾個人的權力慾望，然後犧牲上千萬百姓性命來成就的。毛澤東或蔣介石，哪一個不是手上沾滿了上百萬人的血呢？戰爭不論是那一方獲勝，都注定要生靈塗炭了。

戰爭不只是力量的拼搏，更是智慧的角逐：

國軍怎樣做，人家全知道，人家做什麼，國軍全不知道。幾乎各戰場都是如此。（《關山奪路》，頁296）

中共的優勢之一，就是當地人辦當地事，無須向當地學習，國軍的劣勢之一，就是外地人來辦本地事，又不肯向當地學習。（《關山奪路》，頁169）

國民黨到中共內部做情報工作太難了，簡直雪裡埋不住人，白白送死，國民黨像個大蜂窩，處處可以潛伏，共產黨人找一個洞蹲下，四鄰不能發覺，即使事敗被捕，好歹也還有條活路。（《關山奪路》，頁158）

14 同註13。

國共二方的謀略布局之高下，一比了然。國民黨因過於輕敵而匪諜遍布，機密外洩，情報不靈，如同盲目，共產黨則是情報靈通，洞悉敵情：對國軍佈署與動態掌握精準，故能策定切實有效之戰略。共產黨魔高一丈的精密盤算實乃國民黨所難以望其項背：

中共致勝，由於他的行為處處與國民黨相反，我是說「行為」，不包括動機和結果，「動機」口說無憑，「結果」木已成舟，「行為」才舉足輕重。國共「相反」，非常普遍澈底，幾乎可以看做是兩種文化，一生一剋。可以說，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天敵」，國民黨雖有種種反共制共的方案，其實擋不住，縱然高呼「向敵人學習」，其實學不來。（《關山奪路》，頁304）

國民黨失去大陸，原因很多，我總覺得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軍事失敗，而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由於情報失敗，金魚缸撞保險箱，即使戰後不裁軍，即使沒有馬歇爾調停，恐怕也是這個結局。（《關山奪路》，頁297）

西方領導統御學上有一句名言，兩軍對抗時，越少犯錯誤的一方將獲得最後勝利。不管是否有擁完美的作戰計劃，勝利總是屬於最少犯錯的一方。何況國民黨對作戰並沒有完備的籌劃，失敗已是不可避免的必然。

作者又提到他在天津被解放軍俘去，發現解放軍每天晚上分組開會，彼此交換經驗，改進缺點：

他們縮短睡眠時間工作，國府在東北軍政官員也縮短睡眠時間去享樂，正是「台下積薪台上舞，可憐俱是不眠人。」（《關山奪路》，頁227）

由此可見，決定戰爭勝負的，除了武器裝備的優劣，還有軍隊的訓練有素、部隊的自我約束和政治素質、指軍員的意志和才能。除此之外，更是民心向背：

中國人常說「人多了亂」，所以國民黨害怕群眾、疏離群眾。中共相信「人多拾柴燒火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入虎穴、得虎子、食虎肉、虎威。（《關山奪路》，頁309）

國民黨似乎並非因為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關山奪路》，頁293）

國民黨做事執簡馭繁，拉攏地主、資本家、廠長、校長等上級樞紐人物，重視這些人的利益，但共產黨卻反向而行，搞「農村包圍城市」、「小魚吃大魚」，廣大鄉村盡被共黨控制，國民黨對共軍佈署與動向難以掌握，作戰形同盲目。共產黨結合貧農、不要地主；結合工人、不要資本家；結合學生、不要教育部長；他們的當務之急不是打走日本人，而是一齊動手摧毀這些社會上的樞紐人物，重組社會，並刻意以改革社會的姿態以凝聚人心，提高聲望，世人也就不會去計較他們對日抗戰到底盡了多少心力。（《關山奪路》，頁305）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時代的走向並非掌握在偉人或英雄的手裡，而是由人民的所決定的。國民政府失去了民心，失去了軍隊的向心，也就失去了戰爭的勝利。作者透過文化來比較國共二方的差異：

西方人說，國共內戰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戰爭，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國孔孟文化與馬列文化的戰爭，戰爭結果，中國傳統文化失敗。（《關山奪路》，頁116）

孟子有言：「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若非經過解放大業，怎懂得孟子說些什麼！中共革命是「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國民黨是「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關山奪路》，頁307）

作者從文化思想的角度來評論國共二方。國民黨員走的是「領袖路線」，自以為得到了到領袖的信任，由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共產黨員走的是「群眾路線」，結合群眾，策動暴民「造反有理」，社會充斥著顛倒是非的濁流，惡

質的政治趨策社會人倫綱紀違常，對照傳統禮教束縛的社會偏見，以無形的壓迫深重的挫折個人發展。無論對於失敗一方還是勝利的一方，戰爭帶給人們的都是災難。就社會與世界提昇的角度來看，付出慘重人性異化代價的戰爭雙方根本沒有所謂的勝利。

在那征伐無定、勝負難憑的動亂年代，不論是為自己的利害計，還是為理念主義想；不管是被動地應付，還是主動地爭取，國、共二方其實都在不同程度做出了傷害百姓的舉措，讓天下蒼生不論是心理與肉體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痛苦的過程。對此，作者透過父親的話說出了他心中的評斷：「國民黨共產黨都壞，但是國民黨有多壞，我知道，我估量還可以對付，共產黨到底有多壞，我不知道。」（《關山奪路》，頁421）國共比較，共產黨技進於魔，魔高一丈，正如作者所說：「當初共軍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那時我的同儕都不能發現其中的謬誤。」其實在那紛紜混沌年代，又有幾人能有眼力穿透其間的迷霧？

那些年，解放區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許多孤島，都是封閉的環境，解放區發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中共長於對外宣傳，他給外界的印象、或者說想像，他們殺富濟貧，鋤強扶弱，對一般老百姓有致命的吸引力，那些弱勢族群縱然聽到解放區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釋，自己的家鄉縱然解放了，也不會受到這般對待。等到局勢演變，解放區一再擴大，局外人圈進局內，資訊變成事實，當初「不信」的人也逃難……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舉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聞排山倒海，台灣同胞才從中共自己編導的悲劇中認識歷史。（《關山奪路》，頁114）

作者從人性的角度來解釋歷史現象，凡是超出自身經驗範圍的事，都教人難以相信，中共以審時度勢、順應人性的精心布局，終於佔了上風。作家並未預設任何立場，而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公平地批評雙方。然而共產黨施以思想改造對人性的嚴重扭曲和萎縮，禍害更甚於國民黨。

前車之覆，應為後車之鑑，只有誠實面對自己過去的錯繆而深自悔悟，才

是成長和集體進步的契機。王鼎鈞檢討國共雙方領導方式的偏差和錯誤，是對歷史上的錯誤深刻的總結，也是一種思想文化的建設。任何一種存在之理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他所揭示的悲劇，既是時代的悲劇，也是人性的悲劇，但這些內容如果在兩蔣年代形諸文字，很可能會失去若干年的自由，所以作者在台灣經歷三十年精神囚禁之後，在美國三十年的沈潛冷靜之後，在時隔六十年之後才將這些藏在心裡的話形諸筆墨。釐清史實的脈絡不是為了要排除異己，而是為了穿透歷史迷霧，認識人的價值，王鼎鈞理性地還原歷史現場，反省執政者路線錯誤，咀嚼民主改革路上的種種痛苦和無力阻擋的「悲劇」。他在作品中經營歷史上發生過的悲劇，首先是潛心研究歷史資料，考證歷史事實，並洞悉悲劇的演變過程，以便從各角度揭示產生悲劇的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探究發生悲劇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而作為藝術的悲劇，不是歷史事實的簡單演繹，不只是給人一個理性的判斷，而是要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劃，以及情節發展的設計等，將悲劇衝突藝術地揭示出來。書中一些反省檢討國民革命軍、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的部份，還有對共產黨的絕對荒誕的摧毀人倫做法的評訴仍然值得我們今日深思。論定不幸和苦難不能總用「那是個特殊年代使然」一句打發了事，應該在歷史文化的深層中去找尋根源，王鼎鈞正是用傷痛去點燃更多人心，用傷痛去啟示更多人的深思。

五、存史精神：在時空的結構組織中追訴記憶

全書34篇的專題敘述，具有時間與空間兩條線索，時間維度常被認為是自傳記憶組織的基本維度，也是全書總體的架構，時間猶如一條直線，個體所經歷的事件和行為是在一個有限的時間結構中縫合，有始有終，有起有伏，有血有肉，天然地融合為一體。時間序列為全書故事提供了一種記憶的自然順序，章目的安排就是順序的時間結構，以作者19歲到24歲的人生經歷與生活體驗為起點，「其實每一篇都可獨立成一本大書，因為這裡面所包括的便是中國近代

史中傷痕累累，最血淚淋漓，最為人呼痛不止的一部份」，¹⁵ 這些重大事件，有的是前後，有的是同時發生的事件，作者在記憶提取或遺忘的過程中，被表現為相同的時間序列。這些情節、事件支撐著作者的生命歷史和作品藝術的大廈。可以說，有多少種人生，便有多少故事。這一篇篇的事件記載著一個人、一群人、一個時代人心的歷史。

在時間的序列中，必然出現了地理空間的場景，因為歷史前進的腳步似乎總是以空間化標誌的大事記來計算，所以在全書之前頁作者先畫出了他所奔馳了六千七百公里的「關山奪路略圖」，書中凡牽涉到地名、數字都是信而有徵的，讓讀者清楚地看見國共內戰由開始觸發到兩岸從此天塹阻隔而戰火暫歇。然後在代序〈名詞帶來的迷惑和清醒〉中詮釋現代人所不能了解「那個遠去時代」的「歷史名詞」，如戰區、淪陷區、國統區、解放區、游擊區、收復區、軍事衝突、流亡學生、復員。他以個人記憶復活了歷史場景，其功力在於如何將個人的經歷構成和聯繫成一個時代、一段歷史的人類群體網絡，展現這段歷史中人們的命運，從而在總體上把握這個時代人們的心理脈搏，其過程複雜，經緯萬端，但作者的筆，使這些歷史名詞再度有當下呈現的真實感，完成了這樣一個高難度的創造。

透過回憶，他用時空這根無形之線將歷史與現實連接，但在固定性的物理時空中，亦有著流動性的心理時空，作者正是對他筆下的人物事件進行了一次情感與哲學的巡禮。這種建構，不僅能令讀者感受到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而且還能逐步洞察到民族文化的深隱層次，特別是注意到因社會的劇變而牽動著人們的心理、倫理、道德等多種生活層面的衝突，並以此透視出人們心靈軌跡、心態的游移，傾聽到時代變化的脈動律，並為後人尋找其中的謎團、因果。

在五、六〇年代，文學還是在「權威話語」認同的軌跡上發展，文壇高舉的是政治革命教育的大旗，流行的是「漢賊不兩立」國仇家恨式的沉緬與憤慨，作家「私人話語」是遭禁錮壓抑的。對於國共內戰的發展歷程，至今兩岸

15 向明，〈鼎公的記憶〉，《明道文藝》354期（2005.09），頁76-80。

正史也沒有完整的敘述，對於同一事件的是非功過，兩岸各有自我的解讀與欲掩之隱。對於這一歷史事件的理解，在台灣六十年來，始終停留在「為什麼會輸掉這場戰爭？」這一提問上。蔣介石念茲在茲就是這個問題，數十年來所有已出版的中國現代歷史的教科書，探討的也不外是國民黨為什麼失去中國大陸。這個答案在當時是輿論一律的孤鳴。然而對於1949年的記憶與想像，不應只是從蔣介石政權的成敗得失這個角度去看事件本身。史學一向有「孤證不立」的老話，「從存史的意義上說，不但需要有大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小人物的回憶錄，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憶錄」，¹⁶面對那場民族的災難，置身其中的更多是許多平凡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個人地位或許微不足道，但是現實生活中到處都是小人物，他們代表了真實的生活與人性，不論是戰爭還是正常的社會生活與人性。對於當年的許多軍民來說，內戰都是一場生命的大轉折。關注小人物，就是關注最無可奈何、最值得同情的苦難大眾，也就是關注最沒有掩飾的人生。因此，對於歷史的理解，不應只立足於統治者等主流的立場來看事件，不能只注重英雄主義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忽視了被戰爭裏挾的普通人個體生命的感受。王鼎鈞無意再現戰爭全景，也無意去爭論國共二方的是非，他以超越政治、超越黨派的態度，把焦點投注在生存其中的小人物，以其關懷廣大眾生的心態，立足在人的本位立場記述。由是之故，《關山奪路》全書具有王鼎鈞自我生命歷程的展示，但他又絕不囿限於一己之喜怒哀樂，而是以個人的經歷折射出時代的歷史，通過自己看出一個時代，以回憶錄的形式表現出對社會發展的記載，把身世之感與興亡之悲融為一體。換言之，作者撰述回憶錄並不是要讀者看見「他」，而是要讀者因「他」而了解到那個時空下的每個人，看到戰爭中的千千萬萬個體的渺小、脆弱與無助，戰爭將小人物的命運放大，戰爭中的小人物迸發出的人生光輝也是本書最動人的部份，這使得他的回憶錄可由特殊的小我而昇華為普遍的大我，因而具有存史的性質。

16 王海光，〈回憶錄的寫作和當代人的存史責任〉，《炎黃春秋理論學刊》5期（2007.05），頁59-62。

如果說王鼎鈞第一冊回憶錄《昨天的雲》，是一個混沌未鑿少年的眼光來看世界，第二冊《怒目少年》是用現在的眼光來分析四十多年前的世界，那麼《關山奪路》即是儘可能讓事實的本身去呈現。存史的目的證明了回憶錄與時事的密切聯繫，而回憶錄中有作家自我經歷的介入，又使得作品在言史中更多了一層在場的真實感。後人記錄戰爭的歷史，由於成敗已成定局，往往容易疏忽了當事者在成敗未定時所付出的努力和所犯的愚昧，王鼎鈞讓我們知道，看歷史必須盡量還原到當時。有些史實今日言之容易，但還原成當時則是艱難無比；有些結局我們現在判斷是非功過可以理性以對，但對於身歷其境的人卻很難一刀切割。王鼎鈞客觀直書，以個人記憶來補充、質疑或推翻主流歷史，還原歷史真實的面目，這無疑是有道德勇氣的，他一以位老兵作家的身份，單單直稱蔣介石其名（而不尊稱蔣公），便不是他的老兵作家所能望其項背的，他更別開生面地反省國民黨的軍紀腐敗貪污，同時亦指責共產黨的反人性倫常的病態統治，未預設任何立場，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站在歷史的高度發揮秉筆直書的公正精神。

撰寫回憶錄本身就是一項恢復歷史記憶的工作，需要對歷史負責，不能虛飾，不能挾私。不僅需要有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和他人的客觀態度，還要借助當時的文件等原始資料恢復歷史記憶。由全書的敘述可知，作者下筆前不但閱讀了許多相關的史料與記載，更將自己經歷的片段和時代背景相聯結。甚至大搜天下，尋找當年的共事者，交流、印證與相互補充。這是一個極其艱苦的工作，它需要經過從個別到一般，再從一般到個別的過程，同時需要分析、類比、篩選，這就需要歷史和哲學的兩重視力去觀照、剪裁，經過這樣的過程，即使不能完全還原歷史本然，也會向真實更靠近一步。

六、文學性的對照與衝突的張力設計

如何使這段時期的回憶不流於史料的堆砌，作者是經過縝密的設計安排的。回憶錄寫的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要這些小事值得看，必須提高文學技巧。讓文學得以表現平凡人物的「精彩人生」。「精彩」並不意味著圓滿美

好，而是一種吸引人觀賞的新鮮，怎麼表現精彩呢？作者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對照，二是危機，三是衝突。（《關山奪路》，頁433）對照，是互為相生相成的兩個極端，如災難與獲救、沉淪與超越、山窮水盡與柳暗花明、泰極否來、前苦後甘、大起大落。有對照，意味著百味嚐遍，人生經歷才算完整。而危機，意味著人生不會是平順的，總有許多意外的考驗，有外在的天災人禍，也有禍端自召的個人錯謬。作者每每身陷絕境，又絕處逢生地活下來了，這就是人生的弔詭與奇遇。從對照的角度來看，危機也可以是轉機，端看自己能否以智慧耐力去化解。三是衝突，這是一種矛盾中的兩難，取捨有賴自己的衡定。王鼎鈞在伏埋千里的經歷中仍不斷掙扎前進，在朝不保夕中死而後已，大破大立，全書在行文的節奏中抑揚頓挫，吞吐開合，艱險氣勢不斷，透過文字把那個時代的聲影如此逼真地傳遞給不曾經歷那個時代的我們。如在〈膠濟路上的人間奇遇〉中立身於解放後濟南：

我站在十字路口向南看，若要回老家，就從這裡一直走。我已來到離臨沂蘭陵最近的地方，死火山忽然復活，我心潮洶湧，由拂曉離家的蒙昧，到流亡學校的熱血，倉促投軍的懊喪，不甘墮落的煎熬，生命歸零的恐懼，瞬息之間重演一變。我心裡裝著一具指南針，泰安、曲阜、兗州、滕縣、嶧城、棗莊，這些地名都是磁石，我努力把身體釘在地上，這才明白為什麼舊約裡面的羅德之妻要化成鹽柱，只有那樣他才可以牢牢站定。我站在那裡看了又看，我沒有還鄉的權利，只有漂泊的命運。（《關山奪路》，頁378）

這段文字不僅具有形象的生動逼真，也且帶有獨特而含斂的抒情韻味，畫面是氣象蕭條、色調灰暗的濟南，立身於最接近故鄉的地方，怎不令一個不斷流離的遊子心潮難平？然而故鄉已經被共軍佔領，從視覺轉入內心感應時，就自然地從空間描畫轉入到時間的回顧，讓生命鏡頭一一地在內心轉還，在回溯中達到歷史的滄桑，也展現了作者內心的衝突與矛盾，生命途徑的曲折，人生命運的浮沉。時代社會的衰敗，讓遊子有鄉卻不能歸、欲返而不得返。對付危

機，化解衝突，需要生命力全方位的開展，能夠全心擁抱生命的苦樂，承受生命悲歡的人，才能進而對人生擁有客觀的發言權。回憶錄雖然是作者對自己真實生命旅程的一種回憶，然畢竟是以當下的視角對過去的「我」的新認識與把握，無論其中的「我」與作家本人的「生平閱歷」相似到何種程度，它仍然是虛構意義上的「文本」。作者是從詩意化的角度出發去發掘「個體苦難的歷程」中的美，從審美的規範性中去重新創作與營構自己的回憶，他在回憶深處找到了作品的新材料，在內心進行探索，看到了風景的片段，實現了「傳記文學化的傾向」，其創作的苦心經營，使得作者自己的回憶書寫是在更高層次上對歷史、主題、情節的回歸，換言之，作家的生平閱歷已成了一種不需要虛構即能感人動人的生命故事。

由上述可見，回憶錄具有「歷史」與「文學」的雙向性，在「存史」的原則下，對藝術手法的運用也不能忽視，忽視了藝術手法，就不能與正規史書相區別；忽視了歷史真實，也就不成其為生命「回憶」之輯錄。回憶錄不是史書，而是一種以歷史為主體，採用「藝術手法」展現的「文學作品」。即是「傳記的文學化」，存史精神與文學筆法的交融，在尊重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實行歷史與藝術的有機結合。

歷史是已逝時空的內容，《關山奪路》除了具有史家的春秋筆法，在運筆之際，作者也提出自己的論斷與反思，所以《關山奪路》與一般文獻資料或史料檔案最大的差異在於，它是文學作品，有作家個人的生命思索與人格閃光。史料檔案，只是歷史，其記載往往忽略了當事人置身其中的歷史場景，但歷史場景可能是比文字記載還要重要的歷史記憶，離開了這些場景也許就說不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後人也難具有那些生動具體的現場感。其次，一般歷史檔案或文獻是對當時人們的外在言行記錄，但其內在感受和複雜的思想動機，卻是難以令人準確地感受和真切把握的。這段空白就需要通過當事人的回憶錄來補足，否則一些重要的情節和感情心態是很難說清楚的。回憶錄反映的是在歷史事件中不同的當事人的神態、言行等現場表現。他把抽象、凝固的歷史事件，化為具象、鮮活的生活場景，歷史材料在他筆下成了藝術元素，形成作品特有

的歷史感。如果缺乏情態性的描寫，則歷史記述只是「得形而不得其神」的粗劣摹本，歷史就成了一部生硬刻板的記錄。畢竟只有離歷史現場最近的人對歷史現場的臨摹，才能最接近歷史的真實。只有對歷史情態有了解，作品才能具有歷史的真實感。

戰爭是由戰前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發展而來，戰爭和人類社會生活各方面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繫。所以，戰爭文學不應只是呈現戰場和兵營，而是可以延伸到更為廣闊的藝術視野，從政治、軍事到經濟、文化，從前線到後方，從戰壕到指揮部，從兩軍奮戰到每一個細微的情感波瀾，從最高決統帥的戰略決策到基層大兵的活動，從中國戰爭的形勢變化到世界局勢的風雲變化，甚至普通老百姓的身上……都可以並應該納入戰爭文學的畫卷中。《關山奪路》三十四篇的敘寫實已實現了戰爭文學廣闊的藝術視野。為了使自己的回憶錄與一般正史有所區別，王鼎鈞採取的手法是：「歷史所略者應詳之，歷史所詳者應略之」，在書中揭露了鮮為人知的史實。如對學生鬧學潮的心理因素、對日俘的描述與評價，他沒有簡單地對待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他所鍾愛的，還是他所鄙棄的，他都按照他對人性的體認和把握，揣摩他們當時的心路歷程，與歷史人物的靈魂進行對話，塑造出一大批有血有肉、有呼吸有思想的文學形象。

如他在寫到抗戰勝利後穿上羅斯福總統送給中國士兵禮物，高檔的呢布所製的軍服，再配上一雙皮靴，這般穿戴整齊憲兵裝備時，內心不禁有個假設：

假如當年國軍接收台灣，也先給官兵打扮打扮，台灣同胞還會說他們是「叫花子」兵嗎？還會對中國失望藐視嗎？「第一印象」很重要呵！……假使當年開進台灣的國軍也有這番見識，儘可能注意軍容，抗戰艱苦的烙印不掩興國的氣象，台灣同胞以當時的愛國一念，也能接受甚至欣賞這樣的「王師」。可惜……（《關山奪路》，頁146）

1949年，被日本迫虐的台灣人，在脫離殖民統治後沒有一個人不希望未來能比日治時代更好，當年在那些在岸上等待的台灣民眾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

方式歡迎接收人員的到來，期待見到雄糾糾氣昂昂的軍官，然而，接下來見到迎接的國軍竟是一群疲累推擠、邋邋褸褸的士兵。其間的失落失望與衝突竟揮之不去。¹⁷ 當年這些在戰火中急行了好幾百公里、從血河中跋涉而出的士兵，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裝備極為簡陋，從大陸抵達、接收台灣時，穿著破草鞋，挑著扁擔，兩肩頭吊掛著雨傘、棉被、鍋子、杯子，儀態與體魄立刻被整齊的日軍比下去。相遇的尷尬的畫面竟成為台灣人永遠抹不去的失落。王鼎鈞無遺憾地說：「假如當年國軍接收台灣，也先給官兵打扮打扮……」，然而歷史不能假設，也無法重來，時也？命也？國民黨戰敗的難堪形象已成為台灣人記憶裡的深刻畫面，六十年前的往事，初見面「叫花子軍」的第一印象，代代相傳，頑強不肯退位，也構築了我們這個命運交織的島嶼幾十年來的人們的心裡狀態與生存面貌。

上述的歷史材料，皆為一般正史所忽略，但王鼎鈞卻能一一撿拾，詳人之所略。這些歷史材料並不是一盤散沙的孤立存在，而是附著、交織在人物的命運中，吸納了跳動著的生命氣息與脈搏。六十年前的前塵往事，雖已凝結為一張張發黃的黑白照片，但國民黨當年以失敗者的角色透過六十年的實踐，接納也顛覆了當年的失敗，多年來擔負著歷史的責任，呈現了一個具有獨特價值的台灣。現實與歷史，彼此之間原是互相聯繫，環繞眾生，構成人物活動的舞台，也為作家塑造文學藝術提供了契機與背景。

七、以自我形象展現平凡普通人豐富複雜的心靈 與性格

《關山奪路》是作者在特定歷史年代所遭遇的苦難人生的記錄，也是作家感情經歷的一次真誠的袒露，那娓娓的敘談和不時奔湧而出的激情，在相隔了四十多年後歷史和社會向經濟傾斜的今天，重新又撩起了人們近乎忘卻了那場慘痛的精神災難的重新記憶。回憶錄作為人類生命的一種載體，作為傳記文學

17 可參考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09），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對當時國民黨撤退來台的情形皆有所記錄。

的一個分支，當具有作者與傳主合二為一的獨物品格，這一品格使本書對於人生的審視、靈魂的剖析真實而直接。其中必然有一條作者個人生命發展的主線，即敘述了（1945-1949）近四年的時間他如何從一名流亡學生變成大兵的經歷，這段成長的經歷是透過被欺騙傷害而來。所以作者在本書用兩副眼睛來看待這個動亂的時代，一對向外看，看世局的變幻莫測，人情冷暖；一對向內看，看自己的心潮起伏，掙扎困惑。作者不是簡單地敘寫自己傳奇經歷和苦難的歷程，而是通過對個人生命經歷的描述，以真誠的態度展示了自我感情世界的起伏，堅強與軟弱，多情與無情，崇高與樸實，作者的自我形象不只是藏在文字裡，更是透過他對親情友情的描寫而透露出來的。由作者個人遭遇，我們也可以由此而見到千千萬萬個士兵和農民的遭遇，在這些小人物身上往往能夠發現中華民族內在的生命潛力。

（一）親情之抒發

在逃亡的政治災難中支撐起作家頑堅而堅韌的生命是親情，重點在於父母。尤其是微妙的父子關係，作者經營得十分動人。雖然父子感情深厚，但兩人卻鮮少訴諸言語。他的父親是一位謹慎細心的人，飽經世故滄桑讓他臨事冷靜理性，國共內戰四年間他只流過一滴眼淚。在魯南戰局發生時，父親帶著弟妹在大門外乘涼，見到國軍大隊出行，他惟恐國軍前腳走出，共軍後腳進來，中間不留空隙，他也惟恐國軍出城以後，中共地下人員緊閉城門，禁止出入，所以當機立斷，沒有回到深宅大院裡去多拿一件衣服，便左手拉起小兒子，右手牽著小女兒，緊跟著國軍隊伍走出去。（《關山奪路》，頁102）

依常理推想，父親終於斷然出走，想是因為外面還有一個兒子吧！對於他老人家，我僅是空中的一根游絲，卻也是他的一線希望，這根游絲也許能變成一根繩索，或者是一個救生圈。（《關山奪路》，頁103）

「那一個連一根游絲也要抓住的時代」，兒子成為父親心中的重要支撐力

量。作者也寫到他與父之間傳達感情的方式有時是通過無聲的默契而達成的：

總算能夠和父親通信了，我趕緊把所有的錢寄給他，可恨通貨膨脹，我手中的錢已嚴重縮水。能夠和父親通信，我應該興奮，但是我十分膽怯，他的顛沛流離，我能想像，寫出來，他痛苦，讀一遍，我痛苦，我沒問，他也沒說。我「慌不擇路，飢不擇食」，他也能想像，寫一遍，我痛苦，讀一遍，他痛苦，他沒問，我也沒說。我們的通信簡單扼要，毫不流露感情。（《關山奪路》，頁232）

雖然父子之間交流的是十分簡要，似乎毫不流露感情，但彼此之間的心境卻已深深感知了。

父親十分窮苦，但他從沒有主動催我匯錢。母親已經去世了，父親也瞞住。他每一封信都傳達母親一句話：「你娘說，你每天早晨起床以後，要先喝一杯熱水」。「你娘說，你夜晚要把棉被蓋好。」「要讀馬太福音，你娘說的」。「你娘交代，洗衣服之前，要把每一個口袋掏乾淨」。他老人家不肯一次全說，好像有意製造錯覺，後來知道，他在傳達母親的遺言，他儘可能維護我，估量我能承受的程度。

直到五姨母來了一封信，她說，母親重病時，姨母曾到蘭陵探望，母親有話托姨母設法轉告：第一，幫助妹妹弟弟長大成人，第二，讀聖經，第三，每天早晨起床以後要先喝一杯熱水，第四，夜晚要把棉被蓋好。姨母說，母親去世時神態安詳，彌留之際，蘭陵教會的長老宗茂山，傳道人張繼聖，帶領許多信友到我家，整夜唱詩祈禱。老天爺！我早就有些懷疑了，我跟父親中間隔著一層窗戶紙，誰也沒有勇氣戳破。姨母還說，……我的天！她說的和父親來信所說的一樣，可是父親省略了「幫助妹妹弟弟長大成人」一條。也許父親知道我沒有能力做到，也許父親認為撫養子女畢竟是他的責任，也許他知道即使不說，我也會竭盡所能。（《關山奪路》，頁233）

文中提及母親在臨終前仍心心念念不忘流落在外的長子，一再叮囑，流露出無止境的關懷，然而細細再品味這一段文字，其實文中對母愛表達是為了與父愛形成互補，而且還要在父愛單方傾傾訴已至高潮但尚未盡興之時，借對母愛世界的深情窺探來進一步拓展父愛情懷，使文中所呈現的是一位有著博大的父愛襟懷的父親，也一位能體察母愛及至全部人間親情的父親。

當作者走出俘虜營裡，感到自己不屬共產黨，也不再屬於國民黨，頓失重心，但他清楚知道，身上還有一根線沒斷：

家庭是個奇怪的組織，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災難。

（《關山奪路》，頁102）

我有一個大家庭，我家老父、弱妹、幼弟都在國統區飄泊，母親臨終時托姨母帶話，要我負起長子的責任。母親晚年受盡辛苦，我沒能還家給他一個笑臉，甚至沒能親親熱熱給她寫一封信，若說報答於萬一，也只有照著她的心意全力以赴了。這是我今後生存的意義，我還得繼續向前，今天回想，當時本來無路可走，憑此一念，我終於走了出來，雖然後來國事家事雙重折磨，但若比起土改、反右、文革，又算得了什麼？我不應有恨，不應有悔。（《關山奪路》，頁367-368）

親情是人生最初也是最後的依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道是人性的一部份。父母子女手足純屬天性，在動亂的時代，這份情愛的掛念往往是支撐一個人活下去的最大力量，家人成為作家背負的重擔，作者內心的憂鬱，但苦難也是一種救贖，變成了他人人生得以繼續航行的錨，作者在此傳達出一種自然、真摯、純的人性為基礎的人情美。

（二）生命中的緣會

戰爭是人類所處的極端環境之一，它將人性推向極致，戰爭既可以激發人的大惡，又可恢弘人的大愛。正如王鼎鈞所言：

每一層地獄都有一個天使，問題是你如何遇見他；每一層天堂都有一個魔鬼，問題是你如何躲開他。（《關山奪路》，頁79）

由此可見人性不能簡單地以善惡來區分，所謂「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即意味著人性的矛盾與複雜。王鼎鈞的成長歷程，雖然經歷重重險阻，但生命中仍有奇蹟與奇遇，仍然有幸遇見天使。例如他的直屬楊排長，注意到王鼎鈞的沮喪和萎縮，暗中庇護他：「楊排長常常找我個別談話，他有一間小小的臥房，除了床鋪，只容得下一張書桌。我們隔著桌子面對面坐下，在操課時間，他是一個不動而威的長官，個別談話的時候，他像一個溫和的教授。我有一段時間完全脫離班長的掌握，已是一種幸福，何況又能分享人生道路上先行者的智慧。他雖然年輕，分寸拿捏得準，他暗中庇護我，但從未直接告訴我。」（《關山奪路》，頁82）還有同處逆境而冒險相助的上校爺爺對給了王鼎鈞許多的助援，例如在他感到整飭軍紀沒有希望，決定離開憲兵團，另找生存的意義，去見上校爺爺，上校爺爺了解他家的困境，似乎正等著作者找他，為他安排頂替辭職離任的上尉軍需王鶴霄。（《關山奪路》，頁234-235）此外還有有善良熱心的樂福銅大夫，在王鼎鈞為了被解放軍的砲火打瞎了的一隻眼而奮鬥時，樂醫生面對「身處絕境還不知道取悅於人」的作者，仍然全力幫忙，這份感念並形成了他日後的既定的觀感：「我喜歡眼科醫生，輕柔如一陣和風。」（《關山奪路》，頁375）在四十年後，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王鼎鈞輾轉尋找樂大夫，才知道他已在1967年去世，不免感歎：「人生自古誰無死，怎麼說他不該死於唐山大地震。」（《關山奪路》，頁373）還有瀋陽的地藏庵的女師父，容納王鼎鈞在寺裡讀現代文學作品，提供一個可以容他安靜閱讀、思考和空間，即使作者從未捐香火錢，也不讀她們預備的佛經，她們從未因此怠慢他，作者在五十多年後追憶前事，仍不免要掛念她們：「其間天翻地覆，不知她們怎樣適應，她們的來生當然沒有問題，我憂慮的是今生，只要來生沒有問題，今生也就不必太憂慮了吧？老師父應已圓寂，兩位小師父呢？希望她們度一切苦厄。」（《關山奪路》，頁192）惜福感恩，一直是王鼎鈞待人的習慣，這些出現在作家生命中的善緣，有時他們一句溫馨的問候，一記關懷的

提醒，都能使人生與眾不同。科學家研究以為：「人是唯一能人接受暗示的動物」，生活中或許有陰影與黑暗，但陽光與善良卻依然同在，王鼎鈞把世態炎涼，人間冷暖，涇渭分明地擺在讀者面前，使人們真實地感受到善惡並存、好壞相依的人世真相，展示了人間百態。

人生的歷史總是如此：一切緣於偶然，邂逅後編織為一幅有意義之網。奇遇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緣份，人生的奧妙之處就在於與人相處，形成關鍵性的影響，使你的人生與眾不同。每個人都是穿插在他人生命中的一個片段，不論是父母、子女、夫妻、朋友，都只能是一程，即使只是一程，和他們相處的每一個當下，每一個片段，都可能對我們的生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鼎鈞有幸能遇到幾位有良心、責任感的長官，如直屬楊排長、連長、團長，都是正直的軍官，但是他們都沒有好下場，在亂世中不肯隨波追流，不肯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員，注定成為別人的眼中釘，成為別人排擠下的犧牲品。在逆流橫行的時代，王鼎鈞仍能遇到這些善良熱心的好人，見證人性光輝，固然彌足珍貴，但是看到這些人未能有好報，卻令人格外心酸。有了這些在患難中締結的友誼，在災劫中仍不缺乏純真人性的真實寫照，在人性被扭曲抹煞的時代，仍能讓王鼎鈞堅信「每一層地獄都有一個天使」，人的心靈是美好的。

綜觀《關山奪路》它著重在人物身上開掘屬於他們特有的人生價值，也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環境下，人們對文明社會的進步所作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貢獻。回憶錄中所寫的人物，都是在歷史發展的轉折關頭，作了重大的貢獻，或在作者個人生命的轉捩點上，有了至大影響的人，從這些人物的生平事蹟中，可以有助於讀者了解到有關的時代背景、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軍事與文化鬥爭的概貌及其他有關的事件。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戰爭的殘酷，更讓我們看到人性的希望與創造生命偉大的奇蹟，看到了人類尋求自我拯救的力量。

全書恰到好處地從縱、橫、點、面等不同角度成功地描繪了社會歷史的相貌，有利讀者們對國共內戰的目貌作一部份的把握，不但有帝王將相爭霸天下的主流描寫，在主流之外，更多擷取不起眼的邊邊角角，多了更多人的溫度與味道，讓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亂世之中浮生眾相和萬千心態，從而領略內戰四年的時代風貌，進一步感知在戰爭中平凡的普通人豐富複雜的心靈與性格了。

八、有價值的人生痛苦：戰爭極致下的哲思展示

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更多是取決作家獨特的個體生命體驗和這種體驗的詩意升華。魯迅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¹⁸ 悲劇是偉大的苦難，苦難造就了思想和哲理，同時也造就了偉大的作家。戰爭文學不是婉約溫柔的懷舊，而是試圖從中尋覓一種生命的反思，因為只有回首才會反思，反思文學也是架設人類交流的橋樑，有反思文學在，人類最終將有可能更準確地認識自我，把握自我，創造自我。王鼎鈞書寫《關山奪路》時時從歷史事件中歸納出生活哲理，從生活感受與感情中透露出人生的哲思，讓這本回憶錄具有「以感寫思」的獨特性。以下分別從「突圍」到「建立」兩方面以詮釋之。

（一）對戰爭中的人性競技場之突圍

王鼎鈞在回顧往事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回顧那些年代在他生活的對立面的人物及其相互關係的時候，似乎更多地是從一種人性與道德的角度觀察問題。因為在戰爭中，每個人面臨生死榮辱的抉擇，在存亡危急的關頭，人們往往更多地憑藉個人的覺悟與良知作出判斷與抉擇，因而戰爭又是考驗人的精神世界無與倫比的試金石。它能在一瞬間穿透人的人格面具的偽裝、虛矯。正如作者所說的：

天下已亂，人人學會無情。（《關山奪路》，頁233）

人生在世，臨到每一個緊張關頭，你都是孤軍哀兵。（《關山奪路》，頁336）

母親常說：「我要你安全，不要你偉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偉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沒隨百草」的時代，我不去找危險，危險會來找我。（《關山奪路》，頁336）

我們坐在山村的小院裡，夜色中四圍皆黑，我們先看見光，後看見山，

18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1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頁178。

最後看見月。月光下看重重疊疊山，世界如同廢墟，人和月的關係反而親切，忘了月球也是廢墟。（《關山奪路》，頁45）

故鄉成了解放區，又如何回老家？小鳥不能永遠在家中飛翔，總要有個落腳之處，慌不擇路，一頭撞進網裡，還以為那是個鳥窩呢！（《關山奪路》，頁35）

作者小我的感歎就是眾多人相同的感歎。在那樣的時代，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人生無常，禍福難料，敵友難分，尤其在利害相關的時刻，人生的孤立無援感會異常尖銳，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愈益加深，甚至會感到全然絕望，作者提及黃泛區會戰時，共軍用「人海戰術」進攻，死傷眾多，國軍打到手軟：

世界太可怕了，這要多大本領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這樣一個人憑什麼能夠存活。天崩地坍，我還有什麼保障，平素讀的書，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飛煙滅。我是弱者中的弱者，惟一的依靠是有權有勢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惡的人也有節制。可是命運給我安排的是什麼！（《關山奪路》，頁336）

活之無奈，死亦辛酸，面對信仰的缺失和崩潰，怎能不讓作者痛苦徬徨？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我們都是戰爭的俘虜，戰爭對於我們的影響持續在我們身上、家人之間發酵，成為我們內在無法否認的一部份，只是我們不一定察覺。直到有一天透過回憶錄的捕捉，我們才頓悟到一些早已存在內心深處埋藏多年的感受和心情。命運多蹇，人生多苦，使作者加深了對命運的思索。戰爭是人性的充分展示，當人們面臨著生死的抉擇，便會超脫外在束縛與內在的掩飾展現出人的真實本性。若想贏得戰爭，便要以毀滅他人為代價，在戰爭中的小我，往往不由自主地失去了獨立的生命價值甚至處世原則，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工具與點綴。這是作家發自內心最深處對人生無常的悲歎。

戰爭，可以在多大程度改變了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心靈、人的命

運。王鼎鈞告訴了我們答案，戰爭已在人們心中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傷痛：

我想我們是在張皇失措中挫傷了心靈，以後許多年，我們都不懂得怎樣使別人快樂，也不懂得怎樣使自己快樂。（《關山奪路》，頁407）

作家傾吐出對宇宙、自然、人生的感受和見解。這些感受和見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作家的反思和追求，王鼎鈞以一名士兵的姿態書寫自己的人生，在回溯中達到歷史的滄桑。人生命運的沉浮，時代社會的興衰，這就引了作家關於生命的議論：生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生命的存在卻是永恆的。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當無助與絕望降臨的時刻，往往是生命中的重大的考驗，生命中的無價時刻。

戰爭文學並非僅是馬革裹屍、沙場浴血的描繪，也並非僅是張揚某種道德範型或宣傳某種既定的政治概念，它必須要超越這些比較現實的層面，在一個更高的審美層次上，達到對每一個獨特生命個體及其價值與人生意義的摯愛、關懷、思考與領悟。所以戰爭文學中展現人們在困境中苦苦堅守道德的自律性，這種自律性使得戰爭書寫充分發揮了其淨化的作用，道德的苦守是王鼎鈞一生的堅持，用他的生命力在堅持：

倘若孫子兵法是「真理」，也只是戰場上的真理，不能用於做人做事。
（《關山奪路》，頁161）

這已達到哲學視野的觀照和深邃的歷史眼光了。無論如何，即使是面臨生死交關，乃要堅守道德。一部經典作品的問世，首先是源出于一個偉大的心靈，文學經典本身的價值就在於它凝結於文本中的亘亙古不變的樸拙之美，那是作家對生活和生命的原始而執著的愛，而且，那其中也凝結著作家的真誠、良知、天性美善的精華。從內在精神程度而言，往往表現出對生命、對人性的高度重視，對存在欲望的充分尊重。

（二）戰爭中自我認同之建立

戰爭意味著不同國家、民族或群體之間用生命來扼殺生命，用鮮血澆灌鮮血，基本上就具有反人性、反道德性，「戰爭文學離不開戰爭，但戰爭文學不能僅僅是對戰爭歷史的摹寫，它更應當是作家從戰爭記憶中作出的一種人性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對戰爭整體的反思，而不是對戰爭中的任何一方或個歷史事件的是與非的反思。」¹⁹ 作者在回憶錄中真實地再現一位知識份子個體人格與社會現實相依違的矛盾困境，他在困境中選擇了自己獨立的人生道路、價值取向與生命態度，充分展示了出處生死之抉擇。

時代環境的複雜多元和社會個體獨特的精神結構，即使處在同一社會環境之中，人們也會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和生命態度，而生活又為人們的經驗和活動帶來不同的價值判斷，在多種多樣的個體在特殊的情境下，都表現出獨特的抉擇，這種抉擇與個別的生命態度關聯起來，便形成了人的個性特徵，王鼎鈞正是由於家族意識和社會價值取向以及個人的特殊遭遇才形成了自己個性。當吳排長以國家之名來向學生行騙召生，作者之所以被騙乃因自己「一向痛恨官兵欺壓良民，屢次幻想自己變成劍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做過多少除暴安良的夢」（《關山奪路》，頁25），以為憲兵正是實現他夢想的機會來了。正因血液裡公正的基因才讓他被騙。在發現被騙之後，仍然對未來的人生方向堅定：「因為我已一無所有，也就一無可捨，也就沒有那份能捨的悲壯，這才體會到「捨」也是福氣。」（《關山奪路》，頁47）又如作者在憲兵團的第一天差事，是管區內發生車禍，班長命令他前去看看，肇事事車輛的單位來一位中尉軍官，他把作者拉到旁邊，低聲說：「咱們都是軍人，胳膊彎兒往裡拐，您上天言好事。」不等他說話，捏著一疊鈔票往作者口袋裡塞，作者突然熱血上衝，舉手給對方一個耳光，打得他倒退一步：

我馬上後悔了，我怎麼可以打人，尤其是對方是一位軍官。完全是反射

19 王富仁，〈戰爭記憶與戰爭文學〉，《河北學刊》5期（2005），頁167-178。

作用，也許谷正倫陰魂附體，身不由己。（《關山奪路》，頁173）

谷正倫被譽為「現代中國憲兵之父」，以「不說謊，不作假，守本分，盡職責」為憲兵官兵座右銘。王鼎鈞的性格裡也有著這樣公正嚴明的性格。

又如他在決定離開憲兵六團，仰賴「上校爺爺」的安排，冒名頂替離職的上尉軍需「王鶴霄」，改了名字沒改姓氏，真王鶴霄是個上尉，假王鶴霄的作者卻只能領少尉的薪餉，其間的差額是存進了老闆的賬，但作者仍心懷感念地說：「我知道、我若不乞食，這份上尉的薪餉全部歸他所得……我應該感激他，山重水複、好歹找到一條路，總得紀念修路的人。」（《關山奪路》，頁237）做了軍官可以領到眷糧，每人最多不超過四口，為防虛報冒領，要附全家照片，主辦人替作者找來三個演員拍照，作者內心掙扎：「我勉強照辦，心裡覺得十分驚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覺，忽而又充滿了罪惡感。我又能怎樣呢，以前政府騙我，我無法選擇，現在我們集體欺騙政府，政府也無法選擇。」那個年代冒名頂替的現象普遍，但能像作者這樣內心掙扎，甚至心懷恩的人也許不多：

一九四九年我以王鶴霄的名字入境台灣，不久，台灣保安司令部看到我寫的一篇故事新編，傳去問話，教我當面寫一篇自傳，我立即把兩件事交代清楚：其一，我在聯勤補給單位冒名頂替王鶴霄，其二，天津失守，我成了中共的俘虜。自此以後，我為這兩件事填過各機關寄來的調查表，我實在怕人見到王鶴霄三個字，好像找到了這三個字就找到了我的真贓實犯。多年以後，我又常常思念真正的王鶴霄那個人，好像他真的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我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用它做筆名寫文章。我奉他的名活下來，不知他奉誰的名活著、活了多久。（《關山奪路》，頁238）

王鼎鈞常常因超前地看到某些現象，見微而知著，在生活中堅持了必要的原則。雖然未曾與真正的王鶴霄謀面，但這個名字卻在他的心中引起了空前的

反響。從一開始盜用頂替他人身份的內心煎熬，王鼎鈞最終克服了自己的人性之常，而轉以感念掛懷的心遙想王鶴霄對他的助緣。主體心靈之光對生命價值的燭照和感應，是對生命活力的呼喚，是身心遭劫後尋求感奮勃興的精神寄託，是人生在歷史滄桑中解脫重負的心靈搏動。王鼎鈞他善於把文學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心裡世界和潛意識領域，他不僅對個別人物的心理活動作出了傳神寫照，還刻劃了社會各階層的群體心態，展現出大千世界裡的芸芸眾生。作家並沒有在打擊、苦悶中喪失自己堅定的信念，他在命運沉浮中意志堅定，正如《聖經·提摩太後書》的箴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將這種信念、這種感情借助于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展現給經歷過的、沒經歷過的讀者，其影響應該是不言而喻。

從《關山奪路》中，我們看到作者特有的堅定信念，這信念並沒有因為時代動亂而模糊不清。耿直、善良、堅韌、疾惡如仇、重情重義，是作者的性格特徵；公正、客觀、秉筆直書、警策後人，是作者寫作的目的，他敢於撕碎心肺、拷問靈魂，不逃避、不文飾，直面人生，直面自我，在與外界黑暗和內心陰影的搏鬥中開拓出新的精神境界。他對許多人生體驗的刻骨銘心和從中提煉出來的人生原理，讓人思之再三，心潮難平。這種堅定性，是每個時代的人都希望擁有的。嚮往真善美是類人的本性，文學的作用就是要宣揚這種本性，提煉這種本性，淨化美化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九、結語

回憶錄是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存史方式，存史須具有公正的歷史意識，能在事實面前保持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在真假善惡的邊界上把持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線，對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合理中有不合理，不合理中有合理」，有所理解，有所意識。王鼎鈞經歷的是生命的大痛苦，情感的大爆發，思想的大覺醒，這些生命感受，不僅對個人、對兩岸、乃至對於整個人類都是亘古未有的獨特，記憶讓我們體認到戰爭的殘酷和罪惡，記憶喚醒著所有和平愛好者的良知。一部好作品，對悲劇、對社會衝突和心理是有深刻的分析和表現，《關

山奪路》做為一定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帶著那個時代所有的色彩，抒發了埋藏在人們心底的悲憤與狂喜。正是這時代的印痕撥動了千百萬人的心弦，它的感人力量來自於作家對自我命運及家國命運的深切感知。分以下三點說明以為全文總結。

（一）藉「亂離書寫」打造「存史」與「詳史」的價值

一個人的青少年就這樣被匆匆地拉入到了戰爭的狀態，原本過著正常生活的普通人，身不由己地捲入了戰爭這巨大機器裡，從此，他們的人生不再屬於他們自己。今天，當王鼎鈞以通觀歷史、忠於現實的姿態出現，撥開迷霧，將我們帶回硝煙瀰漫的歷史現場，他不隱惡揚善，不文過飾非，不因人廢言，也不因事廢人，把自己經歷的歷史公諸於眾。作家通過自己的經歷折射出那一個世代裡絕大多數人們的感受，憑藉著「亂離書寫」，打造了現代散文「存史」的價值，讓我們看到了過去四年中眾生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集中地體現了歷史的真實。他對歷史的深刻思考，不是針對戰爭的現實，而是人性在戰爭中的體現，既讓人們看到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異化，也讓人們看到人性光輝的力量。

（二）文學藝術性的展現

在表現方式上，他力圖把戰爭的過程以「藝術的方程式」展現，這種「藝術的方程式」就是用詩的意境概括而形象地反映「歷史」的嬗變和人性面貌，構成了冷峻又熾熱交融的風格。《關山奪路》像是一支複調樂曲，兩個聲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雄渾而浩瀚的氣勢。四年的時間跨度和個人的顛沛流離，使得全書起伏跌宕，大起大落，有的地方如潺潺清泉，從山澗中靜靜地流淌過去；有的地方如天風海濤，氣勢逼人；有的地方如清風霽月之中的鳳管鳴弦；有的地方如幽月寒光中的杜鵑啼鳴，境界不斷地變化、推移，呈現出多種色調，展現了丹青畫手的激揚場面，哲人的銳利深邃，文化人「美麗的憂傷」，有著現代散文難見一見的大氣魄，大境界，然這種氣魄與境界不是從追求戰爭

場面的壯觀而來，而是注重對人性力量的闡釋與掄揚。如果作家內心沒有恢宏的格局，筆下沒有多變的形式，是無法適應創作主體的精神馳騁的要求。

（三）死亡摧逼下的人性異化到極端環境中人性復甦的揭示

一部歷史其實也是一部人們對自身生命本相逐步意識的歷史，《關山奪路》是王鼎鈞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思想認識，客觀公正地回憶血淚斑斑的歷史，因為真實的歷史才能起到醒世教諭的作用。《關山奪路》雖然強烈地反映著時代，深刻地反映了戰爭風貌，但它又絕對不是把文學當作政治史，而是以思想的睿智，冷靜地審視現實和人生，展現著對個人命運和民族命運的思索，它既是時代性的，又與現實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感，這樣作家才能對審美對象作出更為準確的觀察與審美判斷。他不把文學與現實政治貼得太近，他的描寫與展現的重心不是當時的政治革命和經濟危機，而是人們在衝突與矛盾中的思想困境，精神苦悶，正如席慕蓉所言：「作者所要顯現的，不是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中國近代史而已，或許更可貴的，是透過這幾十年的流離與喪亂，讓我們見證了即使一個曾經柔弱與徬徨的靈魂，也可以憑藉著那自身求善求美的努力，終於達到了他要為歷史求真的初心。」²⁰王鼎鈞在全書中集中體現了對生命的眷戀、對死亡的思考、對命運的困惑、對情感的深摯，有著自我人生意義的確認，他所追求的是失落後被扭曲的人格和人性的回歸，他突出作為人所應有的憧憬、理性和自尊的人格尊嚴，人生意義和宇宙意義的追尋，生存、毀滅、永恆這一切事物運動規律的把握，具有強烈的生命意識，生命意識是人類對自身生命所進行的自覺的理性思考和感情體驗，是人類獨特的精神現象。

歷史不能假設，也無法重來，就連括號內的夾注也不容塗改。王鼎鈞以細緻的筆觸，將人物在硝煙殺伐下的悲哀與裂變展示地淋漓盡致，對於戰爭的價值判斷地公正而理性、冷靜。儘管國共內戰的歷史傷痕在時間上離現在已經有一段距離了，同時由於歷史的局限性，在寫作上也難以全數還原現實，但在今

20 席慕蓉，〈歷歷晴川再回首〉，《聯合報》，2009.05.02，副刊。

人看來，依然能夠被《關山奪路》的情節以及所塑造的人物深深地打動著，這裡起著主要作用的，正是人類得以跨越時空，可以互通的一份生命力量與情感依歸。我們珍惜王鼎鈞回憶錄的寶貴財富，並有責任發掘、整理與出版相關史料，全面啟動關於戰爭文學與正面戰場的研究，並將其不斷地推向深入，借以填補現代文史不應有的空白，也為戰爭歷史面貌的全面恢復做出應有的貢獻。

任何一個時代，都期待它們的文學有大師級的作家和經典作品的出現。優秀的作家和作品要超越了時空、國界、民族的限制，為不同時代的人們所接受。基此，一個真正作家的寫作一定是發自內心的寫作，更要創造美的永恆。我們跟隨著王鼎鈞記憶的車輪，隨著作者展開的回憶觀看沿途的風景，同時也見證到《關山奪路》實踐了文學與人生的自覺交融，打開心智之門，關注生命的苦樂悲喜，撩開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這才是創作的最高境界。這種境界是作家的生命和文學理想的有機組成部份，是作家在全書中投注了苦心孤詣的詩意經營而達成的，王鼎鈞的人生，是一個擔當起「偉大」二字的心靈與生命。我們不得不為現代散文中能有如此不辜負偉烈時代的優秀作品而感到欣慰，同也為現代文學界對戰爭文學與發掘與研究的遲緩而深感遺憾。從八二三金門戰役之後，兩岸即使有過緊張，卻再無烽火相向，隔絕了四十年之後開放交流至今已二十年，社會發展的落差，生活態度的迥異，都需要更多更長的時間來磨合或調適。然而戰爭的記憶是不能遺忘的，今天和平生活是昨天戰爭的結果，它深深地留下了昨天戰爭的投影與烙印，其中不僅有著和平之後的幸福，也有深深的創痛與陰影。《關山奪路》提醒我們，和解必須面對真相，面對悲痛。六十年滄桑坎坷，儘管到如今，還有這麼多的對立、衝突和鬥爭，儘管如此，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我們要在回首歷史時，也要兼顧現在與未來。我們也希望王鼎鈞在完成了回憶錄的書寫後要解放人生的怨苦，還有全中國所有受苦受難的人，都要得到解放，重新開始新的人生。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鼎鈞，《關山奪路》（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04）。
-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
- 唐·王勃，《全唐文·卷一八一·王勃》。
-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09）。
-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出版社，2009.08）。
-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9.07）。
- 林博文，《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台北：時報文化公司，2009.05）。
- ，《1949：浪濤盡英雄人物》（台北：時報文化公司，2009.05）。
- 吳錦勳，《台灣，請聽我說——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9.08）。
- 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0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李良玉，〈回憶錄及其對於史學研究的價值〉，《社會科學研究》1期（2004），頁112-117。
- 王海光，〈回憶錄的寫作和當代人的存史責任〉，《炎黃春秋理論學刊》5期（2007.05），頁59-62。
- 王富仁，〈戰爭記憶與戰爭文學〉，《河北學刊》5期（2005），頁167-178。
- 向明，〈鼎公的記憶〉，《明道文藝》354期（2005.09），頁76-80。
- 李宜涯，〈血淚與珍珠——紐約訪王鼎鈞談《關山奪路》〉，《文訊》238期，（2005.08），頁136。
- 楊傳珍，〈戰爭文學的精神轉向〉，《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1卷6期（2008），頁17-20。
- 沈育美，〈穿透1949的女性之眼——談《巨流河》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灣文學館通訊》26期（2010.03），頁57。

二、報紙文章

陳宛茜，〈對岸抗日文學熱——我們重憶國共內戰〉，《聯合報》，
2005.05.08。

席慕蓉，〈歷歷晴川再回首〉，《聯合報》，2009.05.02，副刊。

王鼎鈞，〈給年輕人的忠告〉，《聯合報》，2009.05.17，大河人生版。

